



毛泽东、刘松林、毛岸英

永久的怀念

——访毛岸英的结发妻子刘松林

·郭淑菊·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毛岸英的结发妻子刘松林，打开了她回忆的闸门，畅谈了她与毛岸英的相识、相知和相爱。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他们互助、互勉、互慰，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生死相依的恋人。

刘松林虽然年近七旬，但思路敏捷，尤其是谈及毛岸英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仿佛就在眼前，清晰可见。

无愧于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6岁以前与母亲杨开慧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后来杨开慧被捕，毛岸英随母亲一起入狱。1930年，29岁的杨开慧在长沙牺牲后，毛岸英就与弟弟毛岸青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流浪。刘松林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与毛岸英在影院看电视《三毛流浪记》时，毛岸英触景生情地说，我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我都吃了。因此，到苏联后，毛岸英觉得他是从“地狱”进了“天堂”，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1946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就

有什么特殊，而是服从父亲的安排，进入了中国的“农业劳动大学”，参加了山西省的土改和山东省的土改复查工作。

刘松林至今仍保存着两本毛岸英参加土改工作时的心得笔记。从中可以看出，毛岸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很深很真挚，对工作做得很细很认真。他曾说过，在划分成分时，对于谁该划为富农、谁该划为中农都要经过再三核实、审查，尽量将工作做得细而又细。他曾写信说，他时时不能忘记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感到压力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随毛泽东进了北京。他没有安享宁静、舒适的机关生活，又进入北京机械总厂，任厂党总支副书记。抗美援朝时，他就是从工厂赴朝参战的。在他短暂一生中，工、农、兵全干过，所以有人说他是中国青年的榜样。

患难与共的伴侣

毛岸英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而三年后刘松林才得知这一噩耗。刘松林回忆说，尽管三年中我只收到过岸英的一封信，心中也有疑惑，但我时刻记着分别时他

对我的叮嘱。

那是1950年10月14日，我在医院做阑尾炎手术，他来看我。开始什么话也不说，许久才说他要出差，如果我收不到他的信不要着急。我问他到哪里去，他只回答说是很远的地方。他看我的眼神是那样的恋恋不舍。我让他多呆一会儿，他还是匆匆地离去了。他心里很清楚，在我们结婚一周年前夕的分别意味着什么，但他为了不让我担心，还是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多问，因为在战争年代，分离是经常的，保密也是革命的需要。他临走给我提了三条要求：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完成学业，每个星期都要抽空去看望父亲，替他照顾好弟弟岸青。我含泪一一答应。谁知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刘松林说，我和岸英是1946年相识的。那时他刚从苏联回到延安，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和他只是兄妹相称。因为1937年我刚到延安时演过一个叫《弃儿》的话剧，我在剧中扮主人公弃儿。演完后主席从台上把我叫来，询问了我的情况后认我为干女儿，从此我就和主席以父女相称。1948年我和岸英相爱了。但由于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又是洋学生，对他的爱我心存疑虑。他得知后对我说：“我的母亲为革命牺牲了，你的父亲也为革命牺牲了，我的父亲在为革命工作，你的母亲也在为革命工

中国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

——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专职译员朱彤

·何海清·

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朱镕基总理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了两场中外记者招待会。两位领导人引经据典、妙趣横生，充满睿智和自信的回答，使在场的所有中外记者以及收看电视转播的观众折服。但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了坐在他们身边，嗓音甜美、应付自如的年轻女译员。

随着她在一系列重大活动中翻译席上的频频出现，人们越来越想知道——她是谁？是怎样有幸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的？

由于她对传媒的“兴趣”与公众对她的关注成反比，她委婉地拒绝了所有采访，所以，我们始终难以对她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直到我们采访了她的老师——曾在我国驻外使馆长期从事口译工作，时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褚广友教授，才有

幸撩开她的“面纱”——朱彤，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1999年首届“中国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中的惟一女性。

听力练得耳朵都麻木了

1968年，朱彤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资深的外语专家。

1986年，朱彤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入外交学院英语系。

在褚广友印象中，朱彤是一个“小瘦孩，从不迟到早退，很文雅，对学习抓得特别紧。她聪明不外露，是属于“悄悄”拔尖的那一种。她在班上表现很突出，口译能力更是比别人高出一块。

大学毕业后，朱彤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赶巧的是，那一年，联合国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为

其培训同声传译人才，朱彤有幸进入了这一只招10名学员的联合国高级口译翻译班。在联合国培训班学习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除了三顿饭外就是戴着耳机、抱着录音机听磁带。而且，不光只用耳朵听，还要一边听一边将英文译成汉语，让嘴和耳朵同步。朱彤说，自己的听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有时一天练十多个小时之后，耳朵和嘴都感到麻木了。

1993年，朱彤以优异成绩从联合国培训班毕业，重新回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此时的她已在英语水平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重回外交部后，朱彤意识到，做一名外交部的译员不同于一般翻译，需要随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尤其是外交政策。于是，她就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政治学习兴

作；我八岁时随母亲坐牢，你十岁跟母亲住监狱，所以我们的根是相连的。”经他这么一说，我的疑虑打消了，我认为他心胸坦荡，诚实可依。1949年10月15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新房是李克农的办公室，毛主席作为父亲送我们的惟一礼物是他参加重庆谈判时穿过的一件军大衣。婚后我们相敬相爱，他工作，我学习。

印度赴朝扫墓的哀思

谈起毛岸英牺牲后的情况，刘松林深情地回忆说，当我得知岸英

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毛主席从我妹妹邵华口中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让我到朝鲜给岸英扫墓。1959年，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买了往返车票，并交待我们要私事公办，不要打扰朝方。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叮嘱，过去后就住在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因为我们坚持不打扰朝方，所以由朝方妇联负责人出面接待了我们。当我面对着亲人墓碑时，伤心之情难于言表。回国后我就病了，一病就是四五个月。毛主席得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诫我“毅力为主，药物为辅”。以后我就慢慢

地坚强起来了。1985年和1990年我又曾两次赴朝为岸英扫墓。

谈到去年7月份的第四次赴朝扫墓，刘松林说，这次扫墓的心情和第一次差不多。一是因为今年是岸英牺牲五十周年，二是由于我的健康原因，担心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给岸英扫墓了。因此，当我第四次面对他的墓碑时，心里特别难过，只想和他多呆一会儿，哪怕多呆一分钟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值得高兴的是，回来后经过确诊，我的健康没有问题。这样，我就又有给岸英扫墓的机会了。○